

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编

第一卷

下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

第一卷：政策和执行情况

(下 册)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编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国际贸易研究室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78

毛主席以后的中国经济
第一卷：政策和执行情况
(下册)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 编
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国际贸易研究室 译
(内部发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870,000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4166·196 定价：2.10元

目 录

第三部分 人口和劳动力的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增长……………约翰·艾尔德(3)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中有关

科学和技术的若干问题……………乔恩·西格森(66)

中国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的

就业政策(以农村生产妇女为重点)

……………玛丽娜·索伯格(156)

第四部分 农 业

中国的农业生产……………亨利·格罗恩等(189)

中国的粮食贸易……………弗雷德里克·瑟尔斯(259)

中国农业技术政策和能力的演变…托马斯·威恩斯(289)

第五部分 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理查德·巴特萨维奇等(343)

中美商业关系……………玛莎·艾弗里等(399)

对于同中国贸易的合同、做法和

法律问题的一些看法……………斯坦利·卢布曼(439)

中国硬通货出口商品的分析：最

近趋势、当前问题和将来潜力

……………海地娅·克拉瓦里斯(476)

最惠国关税待遇对美国从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口的影响……………小菲利普·林肯等(517)

美国最惠国关税待遇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出口的影响……………海伦·拉弗尔等(554)

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卡罗尔·福格蒂(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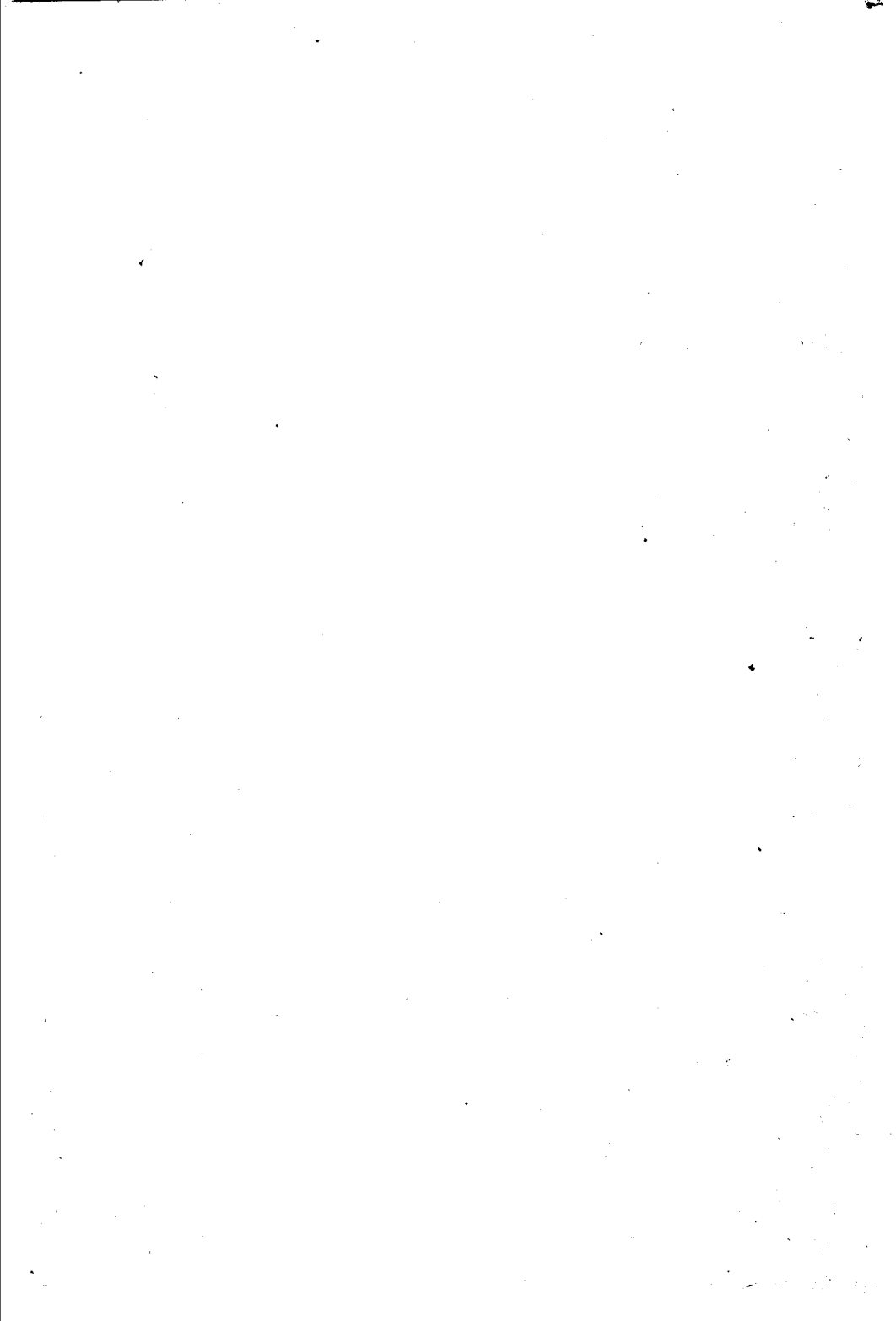
援助对阿尔巴尼亚工业发展的影响

——苏联和中国为主要贸易伙伴

……………艾地·施尼茨尔(588)

第三部分

人口和劳动力的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增长

约翰·艾尔德

要 目

- 一、计划生育的新趋势
- 二、各省新的人口总数
- 三、外国人口分析处一九七六年编制的人口估计和预测
- 四、作为一九七八年类型基础的假设
- 五、新估计和新预测的结果
- 六、总的意义

关于当前节育和保健运动所报道的成就，以及经常重复的八亿总人口数，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外国学者所编制的大多数关于中国人口的估计，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估计显示了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率正在迅速下降，并在某些场合不顾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和一九五七年底人口登记的数字而采用可能是一九六四年调查得来的较低基点的总人口数。这样，这些估计无形中把中国加速控制人口这一目标，当作既成事实来看待了。

一九七六年春，外国人口分析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制了三套估计和预测。这些估计和预测虽然仍以一九五三年普查总人口为基础，却显示了在七十年代前固有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比较缓慢和不规则的下降，随后，出生率迅速下降，一直进入八十年代；而死亡率则稳步下降，一直到本世纪末。中间类型的总人口数在一九七六年年中刚刚超过九亿五千万，而低类型和高类型的数字则为九亿左右到十亿。这三种估计是七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国外编制的所有估计中最高的。

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发生了两件事改变了对中国人口水平和趋势的一般看法。从一九七六年九月毛去世和十月华国锋掌权以来，来自中国的消息指控说，华在接班斗争中的敌手（现被称为“四人帮”）曾反对节育，反对晚婚，并在他们遭到失败前多年来一直使计划生育和公共保健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自一九七六年九月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新闻报道里出现了各省人口的新数字，比以前获得的数字要大，加起来几乎刚好为九亿二千万。

除非有人想争辩说，把挫折归咎于“四人帮”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捏造，否则中国人口估计就不能继续显示出在整个七十年代中期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在不断降低。除非有人还想争辩说，中国各省的材料夸大了人口数字，否则一九七六年外国人口分析处的一系列低数字，以及认为到一九七六年年中全国总人口还没有远远超过九亿的其他一切估计，就显得太低了。

本文的目的是从中国人口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当前中国人口增长的意义，并提出一套新的人口估计和预测的假设、方法和计算结果。

一、计划生育的新趋势

(一) 政策与任务

毛泽东曾经宣布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件“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不会对国家的发展造成困难^①。自从那时以来，差不多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把计划生育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华国锋号召在三年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在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毛和他的同事曾经两次发动节育运动，但是都让运动慢慢消失下去，直到当前，节育运动才似乎成为一项坚定不移的任务。文化革命开始后，重新努力推行计划生育的第一次信号出现在一九六八年，但在一九七二年或一九七三年前运动并未真正得到势头。然而自一九七三年以来，官方比一九五四年第一次运动发动以来的任何时期更公开和有力地赞成节育。唯恐人们认为新的保证会象过去一样发生动摇，权威发言人士现在坚称，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

“中国政府的一项既定政策”，其目的是保证人口增长“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对内对外宣传都赞成这样一个原则：人类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人们必须象控制大自然那样控制自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现在对节育支持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是“毛主席多年来亲自提倡的一项基本任务”。人口增长率以百分之一为目标据说是“敬爱的周总理长期以来的愿望”。据称，华国锋“是国务院节育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亲自制订年度节育工作计划”，出席汇报会、听取汇报、作出指示，并对工作提出理论指导。在稍后一些时候，还曾透露说，华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全国计划生育和节育工作会议上讲了话。他指出，控制人口增长与人民健康和幸福，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最近来自中国的新闻报道说，地方上对执行毛、周恩来和华的节育“指示”作出了保证。没有透露这些指示的内容，但是这些报道显然想要表示这样的概念，即这项政策得到中国最受尊敬的领导人的亲自支持。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把反对这项政策的人指名为林彪、“四人帮”以及各个不指名的“阶级敌人”，所以谁敢反对，谁就会懂得所谓的政治风险。

象第一、二两次节育运动一样，现在把节育的努力放在优先地位，似乎又与官方关心总的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农业发展速度有关。中国官员说过，一九七六年秋推翻“四人帮”前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微不足道的。

一九七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提请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注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只有农业搞好了，才能解决八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能谈得上工业的发展。”^①继严寒的冬季之后，一九七七年春季和初夏发生了干旱，接着在夏季早些时候在一些地区又发大水。一九七七年向国外购买了大量小麦。这年年底，中国农业生产的报道异乎寻常地空洞，没有具体数字，这通常是消息不妙的信号。早些时候有迹象显示，一九七八年中国将再次大量进口小麦，恐怕要超过一九七四年七百六十万吨的最高纪录^②。自一九七八年八月份以来，节育运动显著加强，肯定意味着中央领导看到了控制人口增长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迫切。

（二）运动的策略

当前推动运动的策略也反映了新的决心。中央决定的计划人口增长率为全国树立了总的目标，各省据以订出省的人口增长指标，作为县制定指标的基础，县又为下级单位规定指标。在最低层单位，对符合条件的已婚夫妇，按照先后次序，分配生育额度。先后次序似乎与结婚年龄、结婚年数、夫妇有无孩子以及生了第一胎后已隔了多少年

① 北京新华社（1977年5月12日）发表了他的发言摘要。

② 见简·迈尔：“分析家说今年中国可能成为小麦头号进口国”，载《华尔街杂志》，1978年2月9日。

等有关。有迹象表明，现已规定了每户两个孩子的限制。有几个省保证努力做到在一九八〇或一九八五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八^①。其他省没有公布指标，但负责开展节育工作，以便能保证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人口计划”。

由于完成上级布置的强制性的人口增长指标给当地干部造成不断增长的压力，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时，采用强迫措施就会变得越来越有诱力。自七十年代初以来，来自中国的新闻报道似乎都与各种形式的强迫措施有关。山东一个公社报道了采用“群众性批判”以“摧毁和粉碎”有关婚姻和生育的“反动谬论和封建观念”。在同地区的另一个公社里有一个生产大队，有二十一个妇女“本来应该节制生育的，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于是，干部们“在她们中间增强了团结，消除了她们的旧思想……终于在她们中间树立了计划生育的观点”。其他报道也把“两个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需要”等作为推动计划生育的口号。

中国新闻报道对采用强迫手段没有提供直接证据。在新闻里提到这个题目时，总是反复引用官方立场说节育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对外国听众发布的人口政策方面的消息坚称：“在中国节育是在国家指导下自觉自愿进行的”。

^① 湖北要在一九八〇年达到千分之八，安徽要到一九八五年达到千分之八以下。武汉电台，1977年12月20日；合肥电台，1978年1月18日。

对国内的报道则坚称不会发布“强制的命令”。有一条消息描述一个当地党委对靠“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靠“行政命令”的问题有“争论”。有的委员要求“制订一些严格的条例，以便节省时间并获得迅速的效果”。据报道，在这件事例中，这些委员的意见被否决了，但是所作出的决定并不总是那个样子的，所以有必要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根据难民们的叙述，许多地方公开采用各种形式来实施强制，从有组织的群众小组压力和公开警告到不给产假、不准办出生登记、不配给粮食和布匹，甚至强迫绝育。哪里出现完成指标的强大压力遭到群众的不断抵制，那里就会在干部中产生更大的诱力用强迫手段来确保他们的前途所依赖的权势。有时中国和外国观察家都说，无论在中国或在世界任何地方，对群众用强制的办法，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不论中国人在计划生育方面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必须主要靠人民的自愿合作。但是，事实上在中国的“土改”、合作化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中，强迫手段却使用得很成功，尽管中国共产党总是表白自己用的是说服教育而不是强制手段。引起群众强烈反应的强迫事例，往往被说成是由于当地干部不了解和没有正确执行中央政策所造成的，并被斥责为“命令主义”。

（三）群众的抵制

如果群众的大多数很容易被晚婚和节育的道理说服，并且不加抵制就接受计划生育和绝育，那么，强制性的手段

就不需要了。但是，各种迹象表明事情并非如此。早婚和早生子女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且在第一和第二次推行节育运动中顽强地抵制了为破除这种思想所作的努力。多子多孙被认为是福禄所系，老年所靠，也是孝行的表现。有些人相信生儿育女是命中注定，背天逆命会触怒上苍。有些人觉得避孕不道德，会影响身体健康，而且觉得谈论此事是难于出口的。

第三次运动期间的消息报道提到象前两次运动中碰到的群众抵制的具体例子要少一些。一九六八年，特别在上海，人们非常担心那阵席卷一些工厂的“马上结婚的风潮”，那时干部们也不大敢阻挠，因为害怕责难那些青年冒犯者会招致他们的敌意。这阵“风潮”规模之大，显然足以造成全市出生率的上升。人们抱怨青年人忙于私事，陷入“谈情说爱的时尚”，以及“工厂、农村、学校都有约会、早婚等不健康风气”。在以后几年里，直接了当提到了一些顽固的旧观念，如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

但是，更常见的是用一些抽象的词汇来斥责群众的反抗。反复提到的有旧习惯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些被认为是“难以消灭”并且“在今天仍起着腐蚀和破坏作用”的力量。人们承认“改造”旧思想需要“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艰苦工作，因为旧思想“根深蒂固”。甚至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声称节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陕西省当局也承认“要在生育问题上与传统观念作彻底决

裂绝非容易”。有时斥责旧观念用的词汇更加激烈，如“有毒的影响”、“封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反动谬论”以及林彪、孔子、孟子和他们的“代理人”散布的“余毒”。除了这批顽固不化的反对派外，还有到处存在的“阶级敌人”，他们有时被说成是“一小撮”，然而却明显地差不多到处都有，他们不断地用没有具体说明的方法进行“干扰”和“破坏”。阶级敌人的反抗据说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被指控利用每一个混乱的机会来进行“破坏活动”。一九六八年据说阶级敌人用“糖衣炮弹”击中了一些“青年造反战士”。一九七六年“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仍被描述为“剧烈的”。关于在整个第三次节育运动中持续出现直到今天的群众抵制情况的广泛讨论，清楚地表明抵制还在继续，有些还比较激烈，而且涉及很大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群众。

抵制决不局限于一般老百姓，而且也影响干部们，如在前两次运动中那样。在第三次运动的初期，出现一种倾向，就是在每年一次抓运动的时候对节育也重视一下，但在这年余下的时间里就去管别的事了。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有些同志”认为，计划生育工作与其他任务相比是“软任务”，可以交给妇女干部和卫生部门去干。在整个七十年代，曾反复呼吁对节育工作“加强领导”。有些地区的领导，因未“抓紧”而受到批评；他们被劝告要“一年抓几次，抓紧抓好”。然而仍有些地方党委干部认为“节育工作并不重要”，或者不如生产工作那样重要。有

一个省在一九七七年后期发出通报要求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们“改进工作作风”，“少讲些空话，多做一些工作”。这些指责使人得到的最后印象是，党委也好，卫生机构也好，甚至计划生育部门也好，许多干部对节育工作热情不高，他们只是在别人推他们一下时，才去推动一下工作。帕里什和怀特两人从他们在香港会见难民时得知，仍有许多乡村不重视节育。他们引述一个人——一个曾在生产大队里负责节育工作的官员的话说：

政府规定的指标是，一家不得生两个以上的孩子，但是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三、四个孩子，六个也不罕见，有的有十个、十一个。连官员们也不把指标放在心上，那为什么农民必须遵守呢……？

（四）接班斗争期间的再次松劲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节育工作的新闻报道给人们总的印象是工作得到重大进展，尤其是在主要的城市和省份。迟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接班斗争早已结束，华国锋的胜利正在明显地巩固下来，那时有几个省声称节育工作继续取得进展。一九七六年关于节育工作的新闻报道似乎没有前几年那样多，但是并没有困难增多的迹象。

接着，令人吃惊的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广东省的一则关于省里一次节育工作会议的新闻报道，断言“四人帮”在反对其他国内政策的同时也反对节育。“四人帮”